

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巴勃罗·聂鲁达

(智 利)

得奖评语：

由于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
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
梦想。

(吉)新登字10号

聂鲁达
——大海的儿子
罗海燕 著

责任编辑：张 樱 杜 菲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 春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6年12月第1版

印张：13 插页：4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90 000

印数：1—7 150册

ISBN 7—80604—504—X / I · 92

定价：19.80元

总 序

柳鸣九

古往今来，在世人的头上，曾高悬着各种价值标准，而种种名义的荣誉，从爵位勋章、圣徒称号到奖状奖金，则为价值标准的最高物化体现。价值标准连同它们的“绶带”，如巨光吸引着芸芸众生竞相追求，舍命飞扑，造成了历史的与人生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价值标准是人制定出来的，绶带奖章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又以自己的造物为理想为目标，人是

奇妙的上帝，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壮丽非凡的追求奇观。

每一种价值标准，不论是政治法权的，宗教道德的，社会文化的，学术技艺的，都曾力求保持自己的庄严崇高的“仪表”，都曾声称自己的绝对与永恒。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总要把各种价值标准召唤到它的审判台前来加以检视，让它们辩明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它严格地精选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有助于历史进程、适应广大人群的利益与需要的那些价值标准，让它们成为支撑人类永恒精神文明建构的有力支柱，而汰除掉那些出于谬误观念、狭隘利益、偏激需要的价值标准，不论它们是以何种神圣的名义而显赫一时、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艾尔弗雷德·诺贝尔 1888 年的一天早晨醒来，竟读到了他本人的讣告。这是新闻界报道失误，去世的原来是他的哥哥。这则讣告把他盖棺论定称为“甘油炸药大王”，给他提供了一个身后的视角来认识自我，他看到了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禁感到了震动。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立下了遗嘱，用他的巨额财富设立奖金，以奖励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以及创造性精神劳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人士。

诺贝尔所发明的甘油炸药因带来了大规模杀伤性的战争，而常遭到诅咒，只有当人们需要开山劈岭时才想到它的益处。然而，诺贝尔终于以诺贝尔奖的设立而更著称于世。人对抗自己，人也可以弥补与重建自己。诺贝尔提供了一个范例。

从 1901 年起，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与和平六个方面开始颁奖，1969 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每年颁奖一次，至今获奖者已达到数百人之多，在价值标准如

林、奖章奖杯奖状何止千万的 20 世纪，诺贝尔奖无疑已成为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最为崇高、最受人景仰的一种殊荣，诺贝尔奖获奖项目已成为本世纪人类创造性精神活动与进步事业的集中展现，而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者已形成了本世纪人类真正精英的一支大军。

在 20 世纪这样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制度、各种民族国家利益、各种思想观点尖锐对立、激烈撞击的时代，诺贝尔奖历年各方面的颁奖对象，并非从未引起过任何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但比起种种偏激狭隘的标准，诺贝尔奖毕竟更具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公正的态度，合理的取舍，毕竟是为地球上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所推崇，毕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它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全球性的崇高地位与长存性，就在于它的价值标准中有一最简单然而也最可贵的精髓，那就是提倡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是人存在的真谛。虽然中外均有不少彻悟出世、超凡脱俗之士曾提倡过无为的人生，但所幸从者甚少，且亦难以做到，若人群皆以无为为本，人类恐怕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正是人的有所作为，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而且，个体人的有所作为，不见得就是迷途入世而未达到彻悟，最深刻、最有力的彻悟，是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有所作为性的彻悟。个体人在推石上山时所要付出的艰苦，足以使他内心感到充实。当然，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也有不同的境界与层次，当其理想目标、坚毅精神、艰苦奋发达到了促进人类进步的境界与层次时，其人生即为充实的人生，即为超越于死亡之上的不朽的人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西绪福斯式的巨人，他们的人生是充实的、不朽的人生。

长春出版社决定以一套大型丛书来一一展示这些巨人的人生。展示他们的光荣与复杂，伟大与矛盾，对于我们时代社会，显然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谁不知道聂鲁达?!	(1)
远隔重洋的思念	(1)
不朽的航程	(10)
第二章 从阿劳卡尼亚的冷雨中	
“起锚”	(19)
“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19)
“从那块疆土……出发”	(25)
“诗来找我”	(31)

第三章 初航在“陌生的大海”

——圣地亚哥 (41)

“就像船在风中扬帆” (41)

“我的第一本书!” (49)

“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 (55)

剽窃!? (63)

“我们错过了这个晚霞” (70)

“你沉默的时候叫我喜欢……” (78)

第四章 大洋彼岸“烂灿的孤独” (86)

落入“凹洞”的领事 (86)

“研究着死的辞典” (95)

落成艰难的“居所” (103)

第五章 “西班牙在我心中” (110)

“……当年的马德里哟!” (110)

保卫共和国! (126)

“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133)

“平生承担过的最崇高的使命” (144)

“……战斗,直到胜利属于我们” (151)

第六章 “我只能生活在故土上……” (158)

“这就是我想得到的桂冠” (158)

“米斯特拉尔们” (165)

逃亡者 (169)

拉丁美洲英雄史诗 (175)

第七章 浩淼大洋上的航行 (192)

巴黎的“替身”	(192)
“新世界多么辽阔”	(198)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205)
“船长”与“罗萨里奥”	(211)
诗人与警察	(226)
第八章 远航归来	(232)
返航	(232)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	(237)
斯大林和平奖	(240)
五十寿辰	(243)
第九章 “我弹奏着我那正义而响亮的 七弦琴”	(250)
元素的颂歌	(250)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259)
“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	(268)
诗体回忆录	(279)
第十章 赤子情怀	(292)
竞选总统	(292)
诗人的声音	(299)
诗人大使	(303)
诺贝尔文学奖	(311)
“开枪射击”	(319)
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323)

面对死亡	(323)
1973 年 9 月 11 日	(328)
送别	(333)
遗著	(340)
扬帆远航	(351)
附录 1 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授奖辞)	(362)
附录 2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获奖演说) ...	(366)
附录 3 生平及创作年表	(376)
附录 4 主要作品集目录	(394)
附录 5 主要参考书目	(397)
几点说明	(400)
出版后记	(401)

第一章

谁不知道聂鲁达?!

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加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

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 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 1957, 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能有幸活到10年“史无前例”寿终正寝之日,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梦魂萦绕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一样。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成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成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

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看到，纯朴的人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微笑。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

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前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获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位诗人之间有过多次幽默、诙谐的亲切交谈。艾青曾风趣地问诗人：

“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

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蝻蝻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人民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之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做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

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①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刊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他的诗作才重新与中国读者见面，

^① 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